

通向現代史學之路： 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研究的百年反思^{*}

范靜靜

[提 要] 歷經一個世紀,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早就應該劃上句號了。回看這場爭論,最初只是學術範圍內的正常討論,沒有人因為顧頡剛受到今文經學的影響而否定其現代史家的身份。隨著政局變化,顧頡剛與今文學家質疑古史的行為變成了一種“原罪”,他們的關係因此成為熱點,主流觀點是顧頡剛重蹈了今文學家的覆轍,不是徹底的現代史家。1980 年代至今,延續此前路徑,評價沒有超出以上兩種意見的範圍。只不過之前的極端看法被普遍的折中態度所代替:既承認顧頡剛深受今文經學的影響,又承認他是現代史家。這種態度看似合理,其實不利於解決問題。綜而觀之,既有觀點多半是自說自話,甚至違背邏輯同一律。這從表面上看是學術受制於政治的體現,實則反映了現代學術意識的缺失。需要再次回到原點,先以現代史學的標準從根本上理清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再談其他,否則研究只會陷入低水平與無意義的內捲之中。究竟能否破冰,尚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關鍵詞] 顧頡剛 今文經學 古史辨 現代史學 學政關係

[中圖分類號] K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77 - 12

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已經被討論了一百年。如今再談起這個問題,多多少少都會令人心生厭倦。這種感受不僅折射出學界研究興趣的轉向,更重要的是,其背後表現出人們對研究現狀的不滿、無奈以及對如何推進研究的無力。其中的關鍵在於該問題既在學術範疇內爭議不斷,又嚴重受制於意識形態,而且它們深深糾纏在一起,尤其是後者對前者的強力侵蝕,使得一些看似嚴謹無誤的學術判斷其實多是政治話語的學理內化,而這常常是被有意隱去、難以察覺的一點。由此可見,我們對於現代性、現代學術以及現代史學的理解依舊存在不小的偏差,很多原則尚未成為共識、常識。這是事關學術命途的根本問題,仍然需要特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對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研究能否走出僵局? 本文試圖對此作一總結,進而談一點自己的認識,以期拋磚引玉,儘早結

^{*} 本研究成果由“國家資助博士後研究人員計劃”資助(資助編號:GZC20231391);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20 世紀中國史學通史》”(項目號:17ZDA196)的階段性成果。

束這場毫無意義的爭論。

一、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如何成為了一個問題？

上述問題的提出，表明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原本並不成為問題。而當它開始成為問題時，卻意味著無論是顧頡剛還是今文經學，都遭到了嚴重的質疑甚至是批判。雖說學術問題能否引起爭議是判斷其價值的標準之一，但引起爭議的原因常常在學術之外。沃爾什曾將“造成歷史學家之間意見不一致的因素”分為四類：個人偏好、集體偏見、“有關歷史解說的各種互相衝突的理論”以及“根本的哲學衝突”，全面揭示了學者所持不同意見的來由。^①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性，王學典認為沃爾什的說法稍欠解釋力，並在此基礎上，將“影響 20 世紀中國史學學術史敘事”的因素按重要性總結為四點，即“意識形態、門戶之見、個體偏好以及方法論預設的局限”。^②這樣的看法確實更切近左右中國學術史書寫的實際情況。以上因素在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討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學術與非學術原因糾纏在一起，為透視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橫添了許多歧迷，這是值得深入辨析的一點。

當顧頡剛因提出層累說而初露頭角時，很少有學者捕捉到他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他自己也鮮有論及。周予同則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點：“新史學家的顧胡的學說，實在是今文學家而為現社會所不齒的康有為的諸子託古改制說之進一步的討論”，“但他們受他方面學術的影響較多，也不能稱為今文學者。”^③周予同的評價沒有多少褒貶的意味，只是指出了今文學家所持託古改制說對顧頡剛的影響，這表現在後者借用了是說來質疑古史記載的真實性。與此同時，他並未因此將顧頡剛視作今文學家，所謂“進一步的討論”正是此意，指顧頡剛沒有囿於經學家派，而是從史學層面重新討論了託古改制說的合理性。

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受到普遍關注，還要從《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說起。在這篇文章裡，顧頡剛首次公開且詳細交代了他對今文經學的看法。從中可以看到，周予同的判斷與顧頡剛對自己的剖析相契合。還應注意，此文逐漸成為其他學者論說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重要憑藉。比如孫福熙、曹養吾、沅思、魏應麒以及齊思和等均以此為據闡述己見，但所言都沒有明顯傾向，也沒有超出《自序》的範圍。^④其實，倘若沒有這篇文章，顧頡剛受到今文經學影響這一點也遲早會被很多人發現，因為正如曹養吾所說，“這是顯然的事實”。^⑤《自序》的出現無疑加快了這一進程，甚至日後被有些學者用作反對和批判顧頡剛的鐵證。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以及《三皇考》等文章的陸續刊出讓事情慢慢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雖然已經有學者提到了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但態度並不激烈，看法也比較客觀。這主要是因為此前除了《自序》之外，顧頡剛很少公開發表與今文經學有關的意見，沒有給他人提供評論的機會。加之這一問題在當時不甚重要，而獲得關注又需要契機和時間，所以沒有引起波瀾也是正常的。在此之後，批評顧頡剛的聲音日隆，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開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其中託古改制說尤其是劉歆造偽說被放大，成為爭論的焦點。

最先發難的是梁園東。他對顧頡剛心懷前人有意造偽的成見非常不滿，認為這是對康有為所持託古改制說的誤用，顧頡剛因此成了“‘疑古’的奴隸”、攪亂古史的“煞星”。^⑥相比之下，錢穆的批評雖然較為溫和，但同樣耿耿於顧頡剛“根據今文學派的態度和議論來為自己的古史觀張目”，硬將傳說的自然演進歸於劉歆造偽。^⑦馬乘風則比梁園東更進一步，直接以“顧頡剛古史辨批判”為題，視顧頡剛的做法是“康有為聖人‘託古改制’說之更大膽‘更無理取鬧’的廣泛的應用”，只會將

古史送上斷頭台，沒有任何學術價值。^⑧之後，被視為顧頡剛同道的楊寬也對劉歆造偽說提出了異議。^⑨李季更是站在梁園東一邊，直斥古史辨“承康有為的系統而來”，預謀腰斬古史，毒害古史研究。^⑩由此可見，討論的基調已經變味，與今文經學的密切關係儼然變成了顧頡剛的一樁罪過。他們是從顧頡剛接受了今文經學力主的劉歆造偽說，從而抹殺了古史的角度去評判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與顧頡剛的分歧在於是否認同前人有意造偽以及如何看待古史記載的真實性。雖然批評者的立場或身份有異，對國家道路的不同選擇以及民族危機日深的局勢難免會影響其學術觀點，比如梁園東、馬乘風、李季被拉入唯物史觀派，楊寬被納入古史辨派，錢穆自成一派，但給出的意見還是基於學術考量，擺出了學術證據，也允許進行再商榷，並沒有因為政見問題而強行打壓顧頡剛。值得一提的是，學界常以錢穆其說作為評價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代表性觀點，可是綜上所述，錢穆的態度在當時並不出眾，之所以在後來備受關注，與《劉向歆父子年譜》等論著的影響力擴大、弟子的推崇、學術環境與學風的轉變等多重因素有關，我們沒有必要以後來的情形過度拔高錢穆之言在當時的位置，而應該多關注一下其他人的看法。

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在成為一個學術問題之後，還沒有得到解決，便在時局的裹挾下被政治化了。究竟應該從什麼層面界定他們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其中的學政糾葛，是時人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在1949年10月齊思和發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時，^⑪學界對顧頡剛還算寬容。但這種局面並未持續太久，就被童書業和楊向奎徹底打破了，他們率先發起的批判再一次把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問題推上了風口。^⑫隨後，李錦全、吳澤、袁英光等也參與進來。^⑬相比於前一階段，他們不論從屬於何家何派，都沒有提出新見，仍然是從前人是否託古改制以及刻意造偽的角度進行評價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楊向奎首次借此否定了顧頡剛的史家身份。他不接受託古改制說與劉歆造偽說，進而否定了顧頡剛與此有關的一切觀點。這裡用“否定”一詞並不過分——“他不願意人家稱道他是‘經師’，而喜歡說自己是史學家，事實上他是‘通經治史’，走的是‘公羊學派’的老路，並不是乾乾脆脆的史學家”——楊向奎的言下之意一目了然。^⑭既然是批判，那麼只有把話說到極端才有意義，才能達到預期效果。這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關於顧頡剛的身份認同危機由此產生。可以說，楊向奎是在批判顧頡剛的路上走得最遠的那一位。身處同樣的境地，童書業則格外糾結。他並非從一開始便否認託古改制說與劉歆造偽說，即便到了此時，也很難說完全放棄了之前的看法，這讓他對顧頡剛的學術批判進行得異常艱難。加之個性方面的原因，他很難做到像楊向奎那般決絕。從同時期童書業的學術文章中能夠看到，一旦脫離了批判語境，他的態度便會溫和很多，重新回到了學術軌道上。^⑮這種頗具分裂感的現象在當時並不罕見。

如果他們只是在表達學術意見，那麼爭論再怎麼激烈也不過分，但偏偏和政治運動糾纏在了一起。對此，可以用吳澤的一句話作為注腳：“古史研究，長期間的爭論，實際上是各個階級以什麼樣的史學觀點研究古史的問題。今天，史學界普遍地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觀點，為古史研究奠定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尤其是黨提出厚今薄古方針之後，古史研究更明確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方向。”^⑯政治氣候“規定和控制著歷史評價”，^⑰革命與階級立場成為衡量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決定性因素。^⑱除了楊向奎將顧頡剛歸入開明地主階級之外，其他學者多將其定性為資產階級。雖然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看上去要比被歸入地主階級前進了一步，但實則都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對立面，都要接受批判。而在當時，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更加危險。在這裡，楊向奎並不是出於保護顧頡剛的目的，而是本就如此認為。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重要性反倒被置於其與胡適的關係之後，甚至成為顧頡剛為自己辯白的依據。前面已經說過，這一時期的討論沒有提

出新見,表現出一種思想上的貧乏。而受意識形態的控制,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被做成了定論,直接主導了此後近三十年甚至更久有關此問題的看法。

海外學者的觀點也大致如此。增淵龍夫斷定顧頡剛“和康有為等人所運用的今文學手法是相同的”,所持前人有意造偽這一點已經超越了文獻批判方法的合理限度。^①周策縱簡單區分了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聯繫與不同,指出今文經學是顧頡剛懷疑精神的思想淵源之一,但顧頡剛否定了今文經學關於六經的具體看法,由此粉碎了傳統古史觀。^②施耐德的分析細緻詳盡,也最具代表性。他同樣認為“兩考”對顧頡剛的影響直接且持久,但這種影響要從顧頡剛站在現代史學的立場,接受了康有為的學術判斷而摒棄了其政治訴求的角度進行理解。^③在國內學界一邊倒的時候,國外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聲音。但不得不承認,他們沒有給出特別的認識,其說也沒有在國內產生反響。

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學術話題,大家最初的討論也並無不妥。它從不是問題到成為問題,經過了兩個節點。其一是抗日戰爭。在反對者看來,顧頡剛與今文學家對古史記載的質疑有害於民族團結,理應受到批判。其二是“以唯物史觀史學為中心的敘事”體系的確立。^④在批判顧頡剛所謂原始社會抹殺論的基礎上,他們又手握階級分析法,將顧頡剛和今文學家視作階級敵人,全面否定其學術貢獻。這兩個節點都具有強烈且鮮明的政治特色,致使之前討論的政治性隨之加深。由此形成的癥結是學術意見與政治導向摻雜在一起,讓人不易分清哪些說法還在學術範圍內,哪些說法越過了學術紅線,進而掩蓋、扭曲、代替了學術問題的實質。究其根本,學術與政治之間幾乎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線,它們之間距離的遠近或交集的程度因時因事而表現為不同樣態。同時也要承認,因為學術與政治“對真理的立場不一致”,^⑤所以它們各有相對獨立的領域,有時亦會發生激烈對抗,學術之於政治如此,政治之於學術也同樣如此,但相比於政治,學術總是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具體到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政治對學術的干預日益頻繁、深入的過程中,有關顧頡剛的批判並沒有在學理層面提出新見,而是延續、借重了舊說。不同的是,政治的介入使得這場爭論只能留下最符合其需求的那種聲音,並且將這種聲音放大到極致,使其成為政治與學術共同的真理。正因為如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就此陷入停滯。

二、問題的繼續

直至顧頡剛去世,其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依舊沒有得到像樣的說明,相關看法也多是人云亦云的重複之論。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問題仍保持著相當的熱度,至今還有學者在繼續討論。^⑥但綜合來看,情況並不樂觀。

進入“80年代”,^⑦學隨世轉,人們努力回到學術範疇中重新理解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想要擺脫執拗的歷史慣性並不容易,此前批判話語的陰影仍會不時地出現在漸歸正常的研究中。正因如此,大陸與港台、海外學界的討論才呈現出不同風貌。討論順利進行的前提依然是界定顧頡剛的身份,仿佛非如此不能談其他。受反封建新啟蒙思潮的影響,顧頡剛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定性不再構成主要問題,如蔡尚思、尹達、劉起鈞以及湯志鈞等皆開始強調顧頡剛的反封建精神,以此來給顧頡剛正名。^⑧他們的說辭大致都差不多: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但又比今文經學更進一步。看上去名是正了些,可是顧頡剛的學術工作並沒有隨之得到正視,或者說仍處於一種被取消、被否定的狀態。“還沒有完全脫離今文學家框框,還徘徊於所謂‘託古改制’今文家法的圈子

之中”，“多少重複過去的老路”，“竟滑到今文家的宗派裡去”——懷有這些想法的大有人在。^②其實，這些說辭都是毫無深度的老生常談，已經被說了五六十年。但這也是頗為無奈的事情，他們在沒有其他資源可以借助的情況下，還要顧及意識形態的變化，因而只能不斷地炒冷飯，然後從中排出一個輕重緩急的次序，通過突顯或弱化某些面向來表達意見。當時能做到這樣已經殊為不易，我們應當對此予以充分理解。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既可以成為倒顧的矛頭，也可以變作護顧的盾甲。當不得不任人打扮時，這一問題本身也便沒有那麼重要了。

當有關顧頡剛的認識還在革命史敘事中打轉時，余英時從現代史學觀念出發，再次強調了顧頡剛與今文學家的本質區別，並將其譽為“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③只要對比前文所述，應當很容易發現此說的顛覆性。沒想到被打入冷宮的顧頡剛竟然還能一躍成為現代史學第一人，要知道這種評價早在 1920 年代之後便銷聲匿跡了，如今被余英時旗幟鮮明地提出來，這是非常有衝擊力的。但此說並未激起多少漣漪，要等到 1990 年代甚至 21 世紀以來才受到關注。許冠三也給出了較為公允的評價，有些看法同樣具有開創性。但對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他的態度卻與前人並無二致：顧頡剛“近宗晚清公羊學派論託古改制和新學偽經的大膽假說”，過於相信託古改制說，以致“在許多推想與解釋上不免失之於粗疏，甚至流於武斷”。^④首部探討“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的重要因果關聯”的著作是由王汎森完成的。^⑤他著意從思想脈絡中理解這一關聯，認為顧頡剛繼承了今文經學的歷史觀，今文經學的造偽說構成了顧頡剛疑古史學的核心。儘管王汎森明確指出了二者的區別，但仍能看到他對二者之間聯繫的批評是相當嚴厲的。彭明輝認同許冠三和王汎森的判斷，繼續指斥顧頡剛所持由今文經學而來的造偽說為一種陰謀論，對顧頡剛破壞古史的成績單表示了不滿。^⑥還有一些批評同樣激烈，比如鄭良樹說“顧頡剛通盤接受了康、崔的見解，把劉歆偽造古經當作鐵案，而且也清楚地暴露他承繼康、崔誇大飾偽的態度和作風”，在很大程度上質疑甚至否定了自康有為至顧頡剛的辨偽工作。^⑦對以王汎森為代表的看法提出挑戰的是陳志明。他“修正王汎森太過誇大顧、康‘繼承關係’的見解，以便更明確地顯現出顧頡剛對康有為既有依襲更有批判的繼承關係，甚至了解顧氏超越康氏之處”。^⑧陳志明與王汎森等的側重點顯然不同，但相比於後者，他的觀點早已被遺忘，如今應當重新考慮其書的價值。

從余英時到陳志明的看法，基本反映了海外、港台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態度。如果將其置於從周子同、梁園東、錢穆等以至於童書業、楊向奎、吳澤等的評論中去看，只能說以上研究雖然在既有框架內做出了更為具體細緻的解說，卻依舊沒有進行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反思。即便是從他們立足於思想史視角上說也是如此，突出顧頡剛疑古所具有的思想史意義而迴避、否認其學術價值這一點，也早在之前批判運動最激烈的時候被反復論說過，只是在這裡又得到了強化而已。從 1950 年代至此，人們談論最多的是顧頡剛的思想取向，這與當時的思想運動及反封建思潮、革命史及現代化研究範式、研究者的學術背景等息息相關，其中有些思考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討論更多受制於政治，那麼之後因為出土文獻日益受到重視，顧頡剛的學術論斷被陸續質疑、推翻，學術史上的顧頡剛因此備受批評、冷落，而與此相應，顧頡剛作為思想史家的一面自然被突顯。這些都在走出疑古的聲浪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这股聲浪的直接影響是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學術評價繼續走低。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一些結論早在提出時便有爭議，此時更因新史料的發現而遭到進一步否定。李學勤認為今文經學是導致古代文明被低估的重要原因，應當在肯定今文經學具有思想史意義的同時，從學術層面糾正其造成的冤假錯案。^⑨這一看法成為走出疑古的先聲，並在日後被反復申述，代表了支持走出疑古一

方的主要態度。比如廖名春、張京華等均在此基礎上，力證顧頡剛與今文經學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區別而已”，甚至前者還不如後者。^⑤如此一來，二者的關係又被變相加固了一層。他們延續著既有認識，所謂顧頡剛與今文經學具有思想史價值的判斷已經沒有了多少實際意義，多是起著裝飾作用，而將重心放在了說明顧頡剛與今文經學沒有學術貢獻上。人們依據出土文獻更新了對古書成書及其真偽問題的看法，確實糾正了顧頡剛的一些錯誤認識，但在此基礎上得出的部分結論仍然是待證的假說，短時間內很難有定論。承認顧頡剛的學術觀點存在問題和能否借此推翻他在學術史上的位置是兩回事。若僅僅因為前者便否定顧頡剛的學術貢獻和在學術史的意義，恐怕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而是對學術事實的偏離。歷史仍在重演。走出疑古本來也是在新史料的直接刺激下提出的學術命題，但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拒絕疑古甚至否定懷疑精神的極端聲音開始出現。時間行至被譽為“顧頡剛年”的2006年，^⑥“不止一個作者談到同一個問題：批評‘走出疑古時代’主張的文章發不出來”，“而拒絕支持‘疑古’的聲音，也就意味著輕視乃至抹殺顧頡剛和古史辨派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意義”。^⑦很顯然，這已經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討論。此外，還有一些相對折中的說法，既指出顧頡剛在今古文問題上回到了今文學家的立場，又表示要區分顧頡剛和經學家的本質區別。^⑧這種既怎麼樣又怎麼樣的看法最為常見，前面也已經說過不少。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執拗的聲音在為顧頡剛辯護。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聲音幾乎沒有被認真對待過。這方面的代表是路新生、李揚眉和李幼蒸。他們非常清楚地指出不應把顧頡剛認同劉歆造偽說等同於尊今文家言^⑨；作為學問家的顧頡剛“充分發掘並利用了康氏學說中的學理性因素”，而人們對今文經學的偏見“已大大損害了顧頡剛古史研究的學術品格”，應當回到學術史的角度重新理解二者的關係；^⑩顧頡剛沒有“追隨過什麼主義（今文學）”，“是大步地走著自己的路子”，我們要注意顧頡剛本人的思想獨創性，“不必拘泥於時間上思想影響的先後”。^⑪這些看法邏輯清晰，在當時的語境中尤為重要，但卻湮沒無聞。既然這一時期對顧頡剛的批評是因新史料而起，那麼由此檢討顧頡剛的觀點是否還站得住腳，以及如何看待其在學術史上的位置則是題中之義。所以上述看法在回應走出疑古的同時，也努力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對一些誤區作出說明、修正，試圖減少非學術因素對顧頡剛研究的干擾。

新階段的一個特徵是“學術家凸顯，思想家淡出”，^⑫學界研究整體向實證化、樸學化的轉變也影響到人們對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態度。加之《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全集補遺》等先後面世，^⑬夯實了研究的史料基礎，為多角度透視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提供了可能。對此，儘管不少研究發現了一些被忽略的史實或問題，但並沒有突破既定的前提和框架，反而多是在補充、修正細部。首次對層累說進行階段分析，以及首次以層累說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的是黃海烈。但在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問題上，他依舊遵從了王汎森的说法。^⑭與之不同，李政君、李長銀等則繼續強調顧頡剛沒有走上今文學家的老路，其學術理念始終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⑮這裡想談談張國安的觀點。他指出《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所言顧頡剛受到康有為的啟發這一點“與歷史的真相存在相當程度的距離”，其實顧頡剛大學畢業之前很少受到今文經學的影響。雖然張國安總體上認為顧頡剛最終承襲了今文經學的衣鉢，但對顧頡剛早年與今文經學關係的判斷還是有道理的。^⑯對於這一問題，任何時候都不乏嚴厲的批評者。比如金春峰仍然堅持顧頡剛抄襲了康有為的方法，“違反邏輯論證，以偏概全，顛倒時序，從論據到結論都是錯誤的”。^⑰類似看法至今還有不少。

從 1980 年代至今的 40 餘年裡,除了極個別的研究之外,絕大多數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論述都是在踩著前人的腳印前進,屬於一種知識增長意義上的推進,這也使得相關討論難以衝破原有的模式和預設,從而陷入了內捲狀態。從 1950 年代的思想批判運動開始,到港台學界沿著思想史路數研究這一問題,再到走出疑古聲浪下對顧頡剛學術觀點的檢討,從思想層面與思想史意義上理解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成為主流,因為他們很少認為顧頡剛與今文經學在學術上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主流不見得是正確、合理的。在此過程中,不斷有學者提出異議,要求將顧頡剛研究“納入到學術史範疇中去”,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究竟有沒有學術根據、學術道理。^⑧近年也有學者談到“‘古史辨’受今文經學的影響不是一個不可告人的議題,反而是可以大膽研究的”;古史辨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仍有待發掘,“到現在成果還沒有真正出現”。^⑨這些意見表明,雖然這一問題已經被研究了這麼多年,但既有成果還是不能令人滿意,至少是缺乏說服力的。問題已經擺在了人們面前,可是如何去解決卻不那麼清晰。他們也只是大略指了一下方向,並沒有給出具體方案,因此問題仍在繼續。

三、問題能否劃上句號取決於對現代史學的理解

對於這樣一場跨越了一個世紀的漫長爭論,以上所言雖然難免存在疏漏,但爭論的大體情況以及主要觀點應該是基本呈現出來了,儘管可能並不令人滿意。看過上面的述評之後,或許有人會質疑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是否有必要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對此的回答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經過這麼多年的積累,它已經成了一個史學史、學術史、思想史問題,而且還牽扯到本體論,尤其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想要繞開這座人為築起的高牆,對此避而不談,恐怕不是那麼容易。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質疑,絕大部分原因在於人們認為這一問題本來很簡單,卻因政治力量的介入變得混亂起來。對此,不少人心知肚明,卻也無可奈何。“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⑩這樣的疑問總會懸在當事人和研究者的頭頂,直接影響到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衡斷。近年也有一些學者表示對這一問題的解釋已經走入了死胡同,繼續爭論下去將毫無意義。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揭示了一部分事實。但有關顧頡剛和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能否劃上句號,還有一些地方有待指出和說明。

雖然討論了這麼久,但觸及的實質性問題卻不多。討論主要圍繞顧頡剛是否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以及如何看待這種影響展開。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也無須刻意迴避的事實,包括顧頡剛在內,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否則便是罔顧事實,這是首先要明確的前提。那麼問題自然轉移到了如何看待這種影響上來。對此,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其一,在一些極端情況下,借此否認顧頡剛的史家身份,並貼上階級標籤,認為他重蹈了今文學家的覆轍,不是現代史家。這種看法也不僅僅是在極端情況下才出現,只是在特定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其中有些學者雖然表達得較為隱晦,並不點破這一點,但本意確是如此。其二,既承認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又承認他是現代史家。持此種觀點的人最多。有關分析看上去辯證且全面,似乎無懈可擊,常常給人一種爭論可以到此為止的感覺。其實,該看法大多建立在顧頡剛與今文經學觀點的簡單比較上,基本不涉及深層問題,屬於四平八穩、不易引發爭議的規矩之論。更重要的是,此說潛藏著一種風險,即因為其主張既如何又如何所帶來的模糊性,若稍不留神,便會很容易導向前一種意見,或者在不經意間為之提供了更多證據,反倒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其三,特別突出顧頡剛與今文學家在本質上的不同,尤其注意顧頡剛作為現代學人的獨立性與思想理念的現代性,力圖從顧頡剛為什麼接受

了今文經學，而不是今文經學如何影響了顧頡剛的角度理解二者的關係。這一觀點並不否認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啟發，但強調以何種視角、從什麼層面看待這種啟發——必須參照現代史學的標準，首先從根本上將二者區分開來，才能再談其他。那些主張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無關的說法，便是指著這一點來說的，而不是無視他們在本質不同之外的非本質性、淺表性的聯繫。綜上所述能夠發現，第二、三種意見存在交集，但後者顯然更為直接和徹底。表面上看，這兩種意見只是側重點不同，或者說對顧頡剛學術思想中現代性含量的認定程度不同，而究其實質，則反映出研究者史觀的根本不同，所以不能將這兩種意見簡單等同起來，這是極易被人忽略、誤解卻又至關重要的一點。在三種意見之間，還有諸多具體看法纏繞其中，但考慮到它們不具有典型性，所以就不再贅述了。

上述意見涵蓋了解釋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所有可能，這也是人們覺得研究已經無法推進的主要原因。可是即便如此，爭論依舊沒有停止。而不管如何從具體層面進行討論，終歸還是要回到這些意見上來。對史學研究而言，徹底解決某個問題是奢侈的，因為我們總是需要不斷地闡釋過去以應對現實需求，“而‘評價’歷史本質上則意味著現實對過去的支配”，^⑤各種矛盾意見便由此而來。不得不承認，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個中原因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所以其對話難以有交集，多表現為自說自話，甚至違背邏輯同一律，也就不足為怪了。若非要爭出一個所以然來，是極其困難，有時也是沒有必要的事情。這不是拒絕討論，而是想強調其中的錯綜複雜引起了邏輯混亂，阻礙了有效交流。雖然結果常常是徒勞的，但還是不能輕易放棄對話。正是因為這樣，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以及對此的研究同樣呈現出一種獨屬於它的“歷史三調”。^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不管在解釋問題時受到外界或自身觀念怎樣的影響，我們都無法忽視問題本身所蘊含的學理力量與邏輯力量。也就是說，問題一旦出現，其運行便有著自己的軌道，並不完全取決於人們想要強加給它的意志。這為繼續研究預留了空間。

之所以反復說到“本質”一詞，因為這是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成為問題以及辨明此問題的關鍵，首先與最終指向的還是同樣爭論了長達百餘年之久的現代性問題。它們相生相伴，直至今日。對此的闡述已有不少，^⑦但卻越發收效甚微，甚至出現了觀念模糊且認識倒退的趨勢。簡而言之，現代史學區別於傳統經學的根本在於去權威化，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主要表現為去經典化，進行徹底的史料批判；而去權威化與去經典化的核心要義則是懷疑精神。借用一句話來說，“史學與所有科學一樣”，“所有尚未被證明的，都必須暫時被認為是可疑的。任何命題，若是沒有給出能證明其真實性的理由，則不能被認為是確證的”。^⑧以信還是疑作為出發點去分析史料是衡量是否為科學的現代史學的重要標準，由此自然延伸出證據至上、事實至上的原則，這些都是自成一體系統的。這樣說並不意味著現代與傳統之間毫無關聯，也不意味著史學與經學處於絕對的二元對立中，恰恰相反，它們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程度的張力。此處重在強調現代史學的特質是懷疑精神。把經學信仰放在一邊，努力衝破經學統攝下傳統史學研究的價值天花板，是那批學人走向現代的努力。

以此審視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前述第三種意見最為妥當。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得到說明：其一，顧頡剛不認為孔子與六經有關；其二，顧頡剛認為今古文經書各有真偽；其三，顧頡剛對託古改制說與劉歆造偽說的接受建立在他所認為的歷史證據、歷史事實之上。只要拿出合理的證據，顧頡剛可以隨時修正、放棄這些看法。其實，僅憑第一點已足以表明他與經師群體不會有任何交集。合而觀之，顧頡剛能有如此認識，恰恰反映了其以科學態度治史的現代史學意識。他形成這樣的認識幾經波折，但條目式的敘述難以呈現顧頡剛觀點變化的軌跡以及其中的複雜性。不過整體上看，上述幾個方面是合於顧頡剛治學的宗旨和本意的。隨著出土文獻研究的進展，人們關於古書的觀

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走出簡單的真偽二元論之後,顧頡剛的很多具體觀點已經被判定為站不住腳了。但他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正面解決,反倒因為人們觀念的改變而被取消、擱置起來,其中關於劉歆是否造偽的爭論便是很好的例子。這也是造成討論無效、各執一詞的重要原因。鑑於人們所掌握材料以及認識的有限性,這些問題能否被徹底解決還是未知數,既有研究也只是提供了一種極具開放性的可能而已。從這一意義上講,顧頡剛的研究工作與今人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差別。所以我們可以不同意顧頡剛的觀點,但不能揪住他與今文學家表面上的相似之處不放,以致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本末倒置。由此,討論的重心應該放在顧頡剛如何執行經學史料批判,進而促成了現代史學的誕生與發展,而不是翻來覆去地糾纏於顧頡剛是否跨過了現代的門檻,並以今文經學對他的影響否定其疑古價值。這樣的境況反證了現代性啟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若繼續這種糾纏,相關討論將沒有必要,也毫無學術意義,只有再次回到起點去,先弄清何為現代學術、現代史學,再回過頭來評價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

若想刷新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不得不反思既有的思考方式,這是最挑戰思考力,也是最有可能突破既有框架的一點。進行比較研究時,在什麼層次上確定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立,是很少被嚴肅對待的重要問題。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部分爭論即根源於此,而且這也事關剛剛說過的如何從現代性角度劃定二者界線這一點。國內已經有人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作了討論,^⑤但在具體研究中還呈現得遠遠不夠,絕大多數依舊在循著泛源流論、泛影響論、泛聯繫論的路子走。這種思考方式自有道理,旗下的研究已經非常充分,可是也要清楚地看到其局限性:偏重後設敘事,“熱衷於尋親”,“通常採用類推法”坐實兩件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⑥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和必然性,帶有先驗論和決定論的意味,容易導向排他性。它們難以回答上一段中提出的質疑,內部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要求我們換一種思路作出回應,即考慮到歷史的非連續性和偶然性,注意本質不同的兩件事情之間的斷裂性,^⑦進而探求歷史發生的多種可能。由此出發,或許就不會因為顧頡剛與今文學家有某些相似便懷疑顧頡剛出了問題,而是自覺轉向分析他們在什麼意義上相似,以及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不相似,從而解釋脫胎於傳統學術的顧頡剛與傳統的關係是怎樣的,又何以能夠從中掙脫出來,向現代學術走去。這不僅對理解該問題有幫助,也可以從中窺見學術新舊交替過程的複雜性,以一種開放、共情而不是封閉、偏執的態度面對時人可能會作出的選擇。說到底,背後反映的還是我們能否站在現代的高地上認識歷史以及如何認識歷史。尤其是關於斷裂性和偶然性的看法,是中西史學比較明顯的一個差異,值得我們借此回訪原有的研究路徑,從源頭上檢討相關預設的合理性。

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早就應該劃上句號了。但從其百年研究史來看,這個句號卻遲遲沒有劃上。近年雖然出現了一些要求解決此問題的聲音,但真正的研究並沒有多少。有些學者認為古史辨已經過時了,而且不符合主流取向,所以轉而研究熱門又新潮的問題去了。更關乎本質的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感受:若現代學術、現代史學的標準不能成為常識、共識,若學術不能最大程度地獨立於政治,那麼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或將繼續處於過去的延長線上,很難有終結的一天。事實確實如此,爭論何時能休依然是未知數,或許它“仍將處在這種學術與政治的緊張之中,仍將處在職業歷史學家的求真良知與民族情感的衝突之中,仍將處在一個公民的理性與價值的撕裂之中”。^⑧不止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問題是這樣,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很多其他問題也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究竟能否破冰,還是要依靠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①W. H. 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張文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7、100～101頁。

②②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對學術史書寫客觀性的一種探討》，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③周予同：《經今古文之爭論及其異同（續）》，上海：《民鐸雜誌》，第6卷第3號（1925年3月1日）。

④參見孫福熙：《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北新》，第1期（1926年8月21日）；曹養吾：《辨偽學史——從過去說到最近的過去》，江蘇蘇州：《水荇》，第1卷第1期（1928年5月）；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鳥瞰》，江蘇無錫：《無錫國專季刊》第1期（1933年5月）；魏應麒：《中國史學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285頁；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北京：《燕京社會科學》，第2卷（1949年10月）。

⑤曹養吾：《辨偽學史——從過去說到最近的過去》，江蘇蘇州：《水荇》，第1卷第1期（1928年5月）。

⑥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上海：《東方雜誌》，第27卷第22號（1930年11月25日）；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續22號）》，上海：《東方雜誌》，第27卷第24號（1930年12月25日）。

⑦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170期（1931年4月13日）。

⑧馬乘風：《中國經濟史》第1冊，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會，1935年，第485、507頁。

⑨參見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21頁。

⑩李季：《古史辨的解毒劑》，上海：《求真雜誌》，第1卷第1期（1946年5月1日）。

⑪參見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北京：《燕京社會科學》，第2卷（1949年10月）。

⑫參見童書業：《“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濟南：《文史哲》，1952年第2期；楊向奎：《“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濟南：《文史哲》，1952年第2期；童書業：《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北京：《光明日報》，1955年2月3日。

⑬參見李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廣州：《中

山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吳澤、袁英光：《古史辨派史學思想批判》，上海：《歷史教學問題》，1958年第10期；吳澤：《“五四”前後“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上海：《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4期。

⑭楊向奎：《“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濟南：《文史哲》，1952年第2期。

⑮參見童書業：《序》，顧頡剛主編：《古籍考辨叢刊》第2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9頁。此文作於1957年10月2日。

⑯吳澤：《“五四”前後“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上海：《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4期。童書業也有著清晰的認識：“我們與胡適爭辯脂硯齋是否就是曹雪芹，所爭的並不只是脂硯齋的問題，而是思想方法論的論爭。同樣的，我們與考據家們爭論鐵器是否春秋時代才有的問題，也並不是單純的爭論中國鐵器出現時代的問題，而也是一個思想方法論的論爭。”童書業：《從中國開始用鐵的時代問題評胡適派的史學方法》，濟南：《文史哲》，1955年第2期。

⑰⑮⑮王學典：《語境、政治與歷史：義和團運動評價50年》，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01年第3期。

⑱政治話語至少有以下三個特徵：第一，“動機——不是出於對客體的形態描述或本相探詢，而是重在配合現實時勢或注疏政教定式，以求立竿見影式的輿論導向”；其二，“方式——不是實事求是地從對象出發，對具體命題作具體分析，而是堅執一時一地的僵硬框架去穿鑿文本，上綱上線，攻其一點，以偏概全，以政治裁決來廢黜學術反思”；其三，“態度——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寬鬆寬容，允許商榷、反駁與修正，而是只有一種聲音，挾著霸氣、武斷與威懾，不容證偽，也經不起史實或常識之檢驗”。這些都可以在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討論中得到體現。夏中義：《王國維：世紀苦魂》，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第158頁。

⑲小倉芳彥：《顧頡剛與日本》，陳其泰、張京華主編：《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集》，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第504頁。增淵龍夫的評價見於其作《現代中國史學界研究古史問題的傾向（五）》，此文作於194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之間。

⑳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

命》，陳永明、張靜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8~319頁；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14-316.

②參見施耐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與取代中國傳統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譯，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年，第52、225頁；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44, 204.

③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39頁。

④在中國知網、華藝學術文獻數據庫以及《國文天地》數據庫中，以“顧頡剛”和“古史辨”為主題進行檢索，加之翻閱其他資料，據不完全統計，自1981年以來有相關文章千餘篇，另有相關著作40餘本。

⑤“‘80年代’實際上涵括‘文革’結束至1989年這十多年的時間，指的是當代思想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王學典：《“80年代”是怎樣被“重構”的？——若干相關論作簡評》，廣州：《開放時代》，2009年第6期。

⑥參見蔡尚思：《顧頡剛創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體分析》，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4期；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編寫組編著：《中國史學發展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9頁；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8、182頁；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52~358頁。

⑦楊向奎：《〈論“古史辨派”〉後記》，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成立七十週年紀念》，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4頁；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第354頁；趙光賢：《顧頡剛與〈古史辨〉》，北京：《史學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⑧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陳其泰、張京華主編：《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集》，第518頁。此文首發於香港《明報月刊》1981年5月號。

⑨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75、187頁。

⑩王汎森：《序》，《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7頁。王汎森至今堅持這一看法，認為顧頡剛的疑古與今古文之爭密切相關。參見王汎森：《“顧頡剛先生逝世四十週年紀念座談會”發言紀錄》，台北：《國文天地》，第36卷第7期（2020年12月號）。

⑪參見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42、55~63、163~166頁。

⑫鄭良樹：《論古籍辨偽學的新趨勢（代序）》，鄭良樹編著：《續偽書通考》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第28頁。

⑬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324~325頁。

⑭參見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誌編輯委員會：《人文雜誌》專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第6~7頁；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北京：《中國文化》，1992年第2期。

⑮廖名春：《錢穆與疑古學派關係述評》，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第5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7頁；廖名春：《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陳明主編：《原道——文化建設論集》第4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第126頁；吳少璿、趙金昭主編：《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186、202頁；張京華：《古史辨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79頁。

⑯楊春梅：《為“顧頡剛年”做個標點》，北京：《中華讀書報》，2007年1月10日。

⑰⑱王學典：《“顧頡剛研究”應更多地納入到學術史範疇中去——寫於顧頡剛先生誕辰120週年之際》，北京：《中華讀書報》，2013年6月26日。

⑲參見王學典、孫延傑：《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第325~331頁；劉巍：《〈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與初始反響》，北京：《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⑳參見路新生：《崔述與顧頡剛》，北京：《歷史研究》，1993年第4期。之後，路新生的態度有所變化，轉而認為“關於劉歆造偽一事，顧先生蓋因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影響太深”，“終因太過於相信康有為，輕

信了康氏的劉歆造偽說”。路新生：《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565頁。

④①李揚眉：《方法論視野中的“古史辨”派》，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78、59頁。

④②李幼蒸：《顧頡剛史學與歷史符號學——兼論中國古史學的理論發展問題》，濟南：《文史哲》，2007年第3期。

④③李澤厚的這句話首見於其1994年4月致香港《二十一世紀》編輯部的信中，此信載於該刊6月號的“三邊互動”欄目。參見王學典主編，郭震旦編撰：《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808頁。

④④在《顧頡剛全集》出版之前，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於2007年出版了十二冊的《顧頡剛日記》。

④⑤參見黃海烈：《顧頡剛“古史層累說”初探》，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32～34、215～216頁。

④⑥參見李政君：《1930年前後顧頡剛學術理念的變與不變》，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4年第6期；李長銀：《由經入史：崔適的今文家言與“古史辨”運動》，濟南：《孔子研究》，2021年第4期。

④⑦張國安：《終結“疑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2頁。

④⑧金春峰：《邏輯分析是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評顧頡剛先生的學術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21年第9期。

④⑨李巍、匡釗、吳銳等：《“古史辨”與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王曉興主編：《國學論衡》第9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6頁；另參見李巍：《“古史辨”與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第二屆“預流”的中國哲學研究工作坊綜述》，王曉興主編：《國學論衡》第9輯，第308頁。

④⑩葛兆光：《徘徊到糾結——顧頡剛關於“中國”與

“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解》，上海：《書城》，2015年5月號。

⑤②參見柯文：《序言》，《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⑤③參見李振宏：《顧頡剛疑古史學的現代價值》，山東曲阜：《齊魯學刊》，2020年第2期；李振宏：《漢代儒學的經學化進程》，北京：《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李慎之：《什麼是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慎之文集》，自印，2004年，第403、405、411頁；汪暉：《死火重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頁。

⑤④朗格諾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史學原論》，余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92頁。

⑤⑤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4頁；夏中義：《王國維：世紀苦魂》；范靜靜：《今文經學是否促成了層累說？——層累說提出一百週年之際的思考》，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23年第2期；范靜靜：《古史辨與今文經學關係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年。

⑤⑥小林一美：《中國史學家的義和團源流論》，《義和團研究會通訊》，第3期，轉引自周錫瑞：《中文版前言》，《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張俊義、王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頁；裴宜理：《前言》，《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池子華、劉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頁。

⑤⑦參見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初編《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59頁。

作者簡介：范靜靜，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人員。北京 100084

[責任編輯 陳志雄]